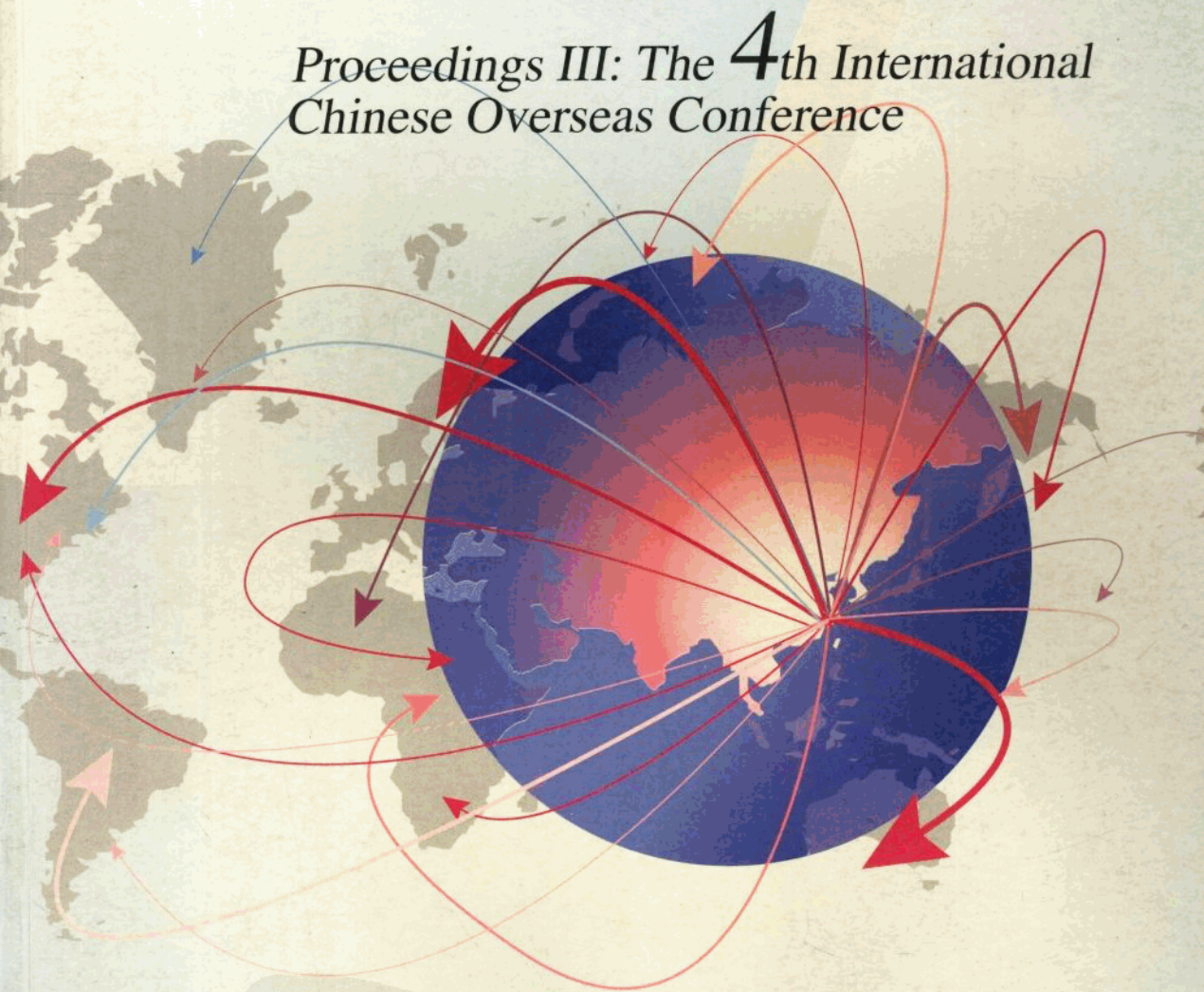


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Ⅲ

Proceedings III: The 4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Overseas Conference



- ▼ 時間：2001年4月26-28日
- ▼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 ▼ 主辦單位：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 Date: April 26-28, 2001
- ▼ Venue: Center for Academic Activities, Academia Sinica
- ▼ Organizer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
ISSP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目次

Contents

(依照研討會之議程順序編排 In order by paper presentation on program)

新加坡華人與 1955 年的工潮：三種版本的歷史解釋	黃賢強 Sin-kiong Wong	1
Singapore Chinese and the Labor Strike of 1955: Three Perspectives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mpact on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李錦興 Kam-hing Lee	12
從商會的演變看華商	吳文煥 Go Bon Juan	38
一葉知秋—從澄海僑情變化看未來潮汕僑鄉的蛻化	黃曉堅 Xiaojian Huang	45
海外資源與僑鄉經濟改革	龍登高 Deng-gao Long	57
閩南僑鄉的華人網絡與華人資本—「晉江模式」到「珠江模式」的轉換	石田浩 Hiroshi Ishida	70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and their Capital in Southeast Fujian; Transition from the "Jinjian model" to the "Zhujiang model"		
財團法人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之功能與展望	曾慶輝 Cheng-hui Tzeng	93
族群認同與文化適應：以馬國雪隆地區客家社團的發展為例	謝劍 Jiann Hsieh 陳美萍 Jiann Chen	101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Case of the Hakka Association in Selangor-Kuala Lumpur of Malaysia		
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初探—兼述現今(2000 年)生活概況	陳美華 Meei-hwa Chern	121
文化認同的獨立性與動力性：	楊宜音 Yi-yin Yang	122
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的演進與創新為例		
向主流社會邁進—近三十年美國華人參政分析	李其榮 Qi-rong Li	135
Stepping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A Survey of the Last 30 Years' Participation of Americans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ing the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to Other Asian Americans in Recent U.S. Elections	連培德 Pei-te Lien	156
比較華裔及亞裔與近年美國選舉之行爲模式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in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	葉宋曼瑛 Manying IP	178
從難民到移民的跨越—泰北前國民黨雲南人遷移模式的轉變	張雯勤 Wen-chin Chang	192
From Hong Kong War Refugee to Canada's Governor-General: the Career of	徐乃力 Larry N. Shyu	210
Adrienne Clarks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Canadians		
華裔伍冰枝就任加拿大總督對加拿大華人的影響		

現狀和未來——以社會網絡的形成和定居化為中心來看世界城市東京的新來中國人	田島淳子 Junko Tajima	221
Styling China Memories in Max Weh's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 and Amy Tan's "The Kitchen God's Wife"	A. Robert Lee	230
Thinking Its Presence: Chinese Space in the Poetry of Mei-mei Berssenbrugge	Dorothy Wang	231
法國華文報刊的發展與演變	陳三井 San-ching Chen	238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France		
試析非洲華人報刊的歷史演變與社會功能	李安山 An-shan Li	261
台灣月刊與旅美台胞初探	蔡石山 Shih-shan Henry Tsai	276
The Independent Taiwan Monthly and the Taiwanese in America—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s of Manila from 1875 to 1905: Aliases, owners-of-Attorney, and other Border-Crossing Practices	吳興奇 Richard Tan Chu	285
Making of History: The 80-20 Initiative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梁侃 Kan Liang	303
80-20 促進會以及華人在其中的作用		
Migratory and Economic Networks in Southern Europe (France, Italy, Spain)	Emmanuel Ma Mung	316
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參政問題	周南京 Nan-jing Zhou	317
戰後馬來西亞華人政治的特點	張應龍 Ying-long Zhang	328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fter World War Two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Service, Fear and Marginalisation ..	詹運豪 James Chin	343
21 世紀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服務、恐懼與邊緣化		
The Political Role of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許天堂 Benny G. Setiono	359
從華僑喉舌到華人橋樑——東南亞華文報刊的世紀歷程	周中堅 Zhong-jian Zhou	371
論印尼華人 1998 年以來興辦的新聞事業	黃昆章 Kun-zhang Huang	388
馬來西亞華族民間學校文化團體出版的刊物初探	蘇慶華 Khin-wah Soo	395
Reality of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Rainbow"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陳天璽 Tien-shi Chen	409
Myth and Reality of "Hop Alley," St. Louis Chinatown, 1860s- 1920s	令狐萍 Huping Ling	434
聖路易唐人街的神話與現實，1860s-1930s		
Ethnic Banking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inese American banks in Los Angeles, ...	李唯 Wei Li 周宇 Yu Zhou Gary Dymski 徐惠玲 Maria W.L.Chee	471
California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朱永德	502
中華民族意識之覺醒～海外華人向日索賠運動之梗概～	Yungdeh R. Chu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華人與當地排日運動	王秀惠	524
The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an Wa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	Leo Douw	544
Towards a Research Strategy for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新加坡華人与 1955 年的工潮：三種版本的歷史解釋

黃賢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

前言

戰後新加坡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就是工潮疊起。新加坡的勞工運動與華人社會有密切的關係。雖然不是所有的工會都是由華人勞工發起和領導的，也有些工會的會員和領導人是以其他種族為主體，例如政府部門和港務局的工會主要是印度籍工友組成和領導。¹ 因此，也不是所有的工潮都是由華籍工人所發動的。但以當時華人在新加坡總人口中佔有四分之三的高比率來看，可以瞭解華人工友和工會在勞工運動中的地位。有許多私人企業（如製造業和交通業等）的資方和勞方都是以華人為絕大多數。所以，新加坡工運的整體發展與華人社會的變遷不可分割。本文所討論的焦點，即 1955 年的福利巴士工潮 (The Hock Lee Bus Strike)²，便是以華籍工友為主的工潮事件，而且罷工者所要鬥爭的福利巴士公司，也是一間華族經營的公司。³ 有關這個工潮的來龍去脈，眾說紛紜。本文將從不同視角，剖析三種版本的工潮歷史。

一、福利巴士工潮的發生：史事版的歷史

新加坡工運發展的高潮始於 1955 年，因為當年是新加坡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也對工運的蓬勃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林德憲制 (Rendal Constitution)⁴ 下，新加坡於 1955 年 4 月 2 日舉行第一次的立法議員選舉。選舉結果，以馬紹爾 (David

¹根據 1948 年的一個調查統計報告，新加坡政府部門和港務局的印度籍勞工人數有 17,620 人，超過華籍勞工的 12,589 人。在製造業、交通業和商業等方面的華籍勞工則遠遠超過印度籍勞工，人數分別為 67,311 華工對 6,637 印工。Labour and Trade Union Organisation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reported by S.S. Awbery and F.W. Dalle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48), p. 56

²所謂的“巴士”即英文 Bus 的音譯，當地人對公共汽車的俗稱。

³在 4 月 27 日和 5 月 12 日集體採取同情罷工行動的六間巴士公司，也都是華人公司，他們的雇員絕大部分是華族。

⁴所謂的林德憲制，肇始於 1953 年底。因為緊急法令自 1948 年實行以來，共產黨對新加坡的威脅明顯減少。殖民地政府也順應國際潮流，準備逐步給於新加坡人民較多的參政權。於是，新加坡總督委任一個憲制委員會，由林德爵士 (Sir Rendal) 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的工作是對憲制改革作出全盤的研究和檢討。1954 年 2 月，委員會的報告書公佈，其中一個建議是將立法議會改為民選議員占多數的議會。1955 年 4 月的選舉，就是林德憲制的產物。

Marshall) 爲首的勞工陣線 (Labour Front) 獲得最多席次,⁵ 並經總督授權組織第一個民選政府。新政府的成立並沒有改變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控制, 因爲總督仍掌握內部安全, 外交事務和財政大權。但這次選舉的意義在於讓人民的聲音可以透過更多的民選議員帶到立法院去。勞工大衆對這次的大選結果很滿意, 因爲獲勝的勞工陣線一向標榜社會主義路線, 應該是勞工運動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由於受到勞工陣線勝利的鼓舞, 大選以後, 新加坡的工潮頻頻發生, 創下空前的紀錄。在 1955 年的這一年當中, 就有 373 次之多。⁶

工潮劇增的原因, 也可以看出共產黨份子在工會中經過幾年的潛伏和運作, 終於等到時機, 浮出臺面, 積極的製造工潮。福利巴士工潮就是新加坡工運史上的一個高潮。1955 年 4 月 24 日, 福利聯合巴士公司的 150 名前雇員, 爲了抗議資方不合理的將他們辭退, 強行佔據公司位於亞歷山大路的巴士停泊廠, 阻止所有巴士駛出。抗議的工友甚至晚上也留在車廠外露宿示威。此舉一連持續了 21 個晝夜。

福利巴士罷工期間, 不斷有華校生以及各其他工會和社會團體代表到場慰問工友, 爲數達上萬名。有些支持者和同情者慷慨捐贈金錢, 作爲工友罷工期間的生活費,⁷ 以表示全力支援抗議行動。雖然警方分別於 4 月 27 日與 5 月 10 日二度企圖以強大水力和警棍驅散聚集在廠中的工友, 但都沒有成功。而且, 警方的武力鎮壓反而引起勞工大衆的不滿, 使更多勞工朋友同情罷工工友。於是, 罷工潮開始擴大, 不久有六間華人經營的巴士公司⁸ 的工友集體停工四小時, 以抗議警方對福利罷工工友採取過份粗暴的鎮壓手段。

5 月 12 日, 工潮局勢急速惡化。因爲有多達 37 輛載滿大批工人和華校生的卡車和巴士, 相繼駛抵車廠支援抗議工友。罷工工友和華校生呼唱“團結就是力量”和“我愛馬來亞”。⁹ 現場人群的情緒高漲。下午四時起, 現場約 2000 名示威群眾開

⁵ 在林德憲制容許的 25 個立法議會民選席位中, 勞工陣線贏得 10 個席位。另外, 其他贏得席位的政黨包括進步黨 4 席, 人民行動黨 3 席, 民主黨 2 席。

⁶ 根據統計, 1945 至 1948 年之間, 新加坡每年有 15 次至 65 次的工潮。而 1949 年至 1954 年之間, 工業糾紛降至每年 2 次至 17 次。在 1955 年的之一年當中, 則劇增至 373 次。見甘永川, 〈新加坡的群眾運動與社會變遷〉, 《南洋學報》, 53 卷(1998 年 12 月), 頁 89。

⁷ 《南洋商報》, 1955 年 4 月 29 日。

⁸ 此六家巴士公司是: 星柔, 樟宜(Changi Bus Service), 巴爺黎巴(Paya Lebar Bus Service), 榜鵝(Ponggol Bus Service), 加東勿洛(Katong Bedok Bus Service) 和綠色(Green Bus Pte Ltd)。他們都于福利巴士公司一樣, 同屬巴聯的會員。

⁹ 李炯才, 《追尋自己的國家: 一個南洋華人的心路歷程》(臺北: 遠流, 1989), 頁 287; Goh Hwee Jiang, “The Hock Lee Bus Riots 1955,”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3, p.17.

始以磚塊、木棍與鋤頭等攻擊警察。結果雙方展開嚴重的衝突。一直到翌日凌晨 3 點，整個暴動才告平息。在這次的暴動中，共有 4 人死亡和 31 人受傷。¹⁰

五一二暴動後，福利巴士工潮沒有馬上結束，局勢仍然緊張。暴動後連續兩天，新加坡全島都籠罩在恐懼當中。整個城市幾乎癱瘓下來，因為許多巴士司機展開支援罷工行動，集體停駛。5 月 16 日，馬紹爾親自出面解決這個勞資糾紛。他強制資方（巴士公司）接受其建議。其中包括：

- (1) 巴士公司即刻解散新組織的公司職工會，無條件承認巴聯(SBWU)¹¹為工友的工會的地位。
- (2) 全部罷工工友獲准復工。
- (3) 雙方有關其他糾紛，交由仲裁人全權處理。

這個解決方案普遍被各界認為是對勞方的讓步。馬紹爾本人也被攻擊為軟弱無能，沒有以強力的軍事行動及早回應馬共(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和左派工會的挑戰。但有學者認為馬紹爾不相信強力的警察行動能真正解決問題。¹²更重要的是，馬紹爾本人是民主政治的信仰者。他在立法議會為自己的做法辯護：“如果我們在 13 日（暴動）之前採用子彈和緊急法令來維持次序，我們將完全的毀滅民主的精神和它在新加坡的存在價值。那我們將與我們痛恨的（殖民地政府）舊制度沒有差別。”¹³

不管是因為馬紹爾的民主態度，還是他對共產黨的軟弱和屈服，¹⁴共產黨和左派工會的確在他主政的 14 個月中急速的擴張實力。這可從這段時期工潮發生的空前多次數得到印證。1956 年 4 月，馬紹爾突然辭去首席部長一職，並提名林有福接任。林有福雖然與馬紹爾同屬勞工陣線，但對共產黨和左派工會的態度有極大的不同。林有福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鬧事的反政府份子。林有福曾在立法議會中提出警告：“假如，任何一個集團，可以用民主的名義，要脅政府，直至達到他們的要求為止，那麼，這個政府，就變成一枚樹膠印，而那些藐視法律之徒，那些大聲叫喧，以恐嚇手段欺人的份子，便會大行其道。”¹⁵換言之，林有福不準備讓他的政府作個樹膠印，而是要強力反制反政府份子。在另一個場合，他更清楚的表達他的看法：“為新嘉坡

¹⁰ Richard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83*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4), pp. 108-111.

¹¹ 即“巴士車工友聯合會”(Singapore Bus Workers' Union)的簡稱。

¹² Chan Heng Chee,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3.

¹³ Chan,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p. 104.

¹⁴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頁 289。

¹⁵ 新力報編，《新加坡大暴動全貌》，頁 34。

之前途計，法律及次序必須維持，任何人惡意與抗拒地蔑視與低估法定政府者，必須於以嚴厲對付。¹⁶

二、工潮是反剝削反殖民的鬥爭：勞工版的歷史

在勞工版的工潮史中，他們歌頌勞工階級是英雄。如果代表左派的勞工是英雄，那麼，代表右派的殖民主義或統治勢力（政府）就是惡魔了。左派勞工追求的理想是“打倒資產階級”，“推翻殖民統治”，“還我勞工權益”等。這類的論調和歷史敘述在左派份子的言論和左派工會的刊物中可以得到印證。《巴聯十四周年紀念刊》中，記載工會領導人追求的理想是為工友爭取一個免受剝削，免受壓迫的工作環境。他們首先要為福利巴士工友爭取的就是加入工會的權利。但在爭取的過程中是困難重重的。正如他們的紀錄所述：

福利巴士工友還沒有加入本會之前，是沒有被組織起來的散漫的一群，生活待遇及工作條件之惡劣不必說，工友與工友之間除了工作外是不可互相交談，倘被發現是會被開除的。總之，當時他們的飯碗是要看雇主的喜，怒，哀，樂來作決定！雇主說明天不用來了，工作便隨風飛了。工友的工作沒有絲毫的保障是可以想像的，在當時局勢的鼓舞下，加入工會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他們急於實現的一致願望。正當該站[作者按：亞力山大站]工友回應本會的號召，紛紛加入本會，成立站委會組織，向資方提出改善待遇要求，便引起了資方的恐慌而採取行動開除該站的負責人，為此，工會雖曾與公司舉行談判，但由於資方態度強硬致談判宣告破裂。¹⁷

這只是困難和障礙的開始，接著，資方一方面利用一些沒有加入巴聯的工友來組織一個所謂的“黃色工會”¹⁸與巴聯分庭抗禮，另一方面卻暗中召募新工，準備隨時替代罷工工友。果然沒多久，資方便“雇用新工接替舊工友之工作，並發出通知書辭退全體停工之工友，翌日工友欲上工，不但遭資方拒絕，並且還召警察及鎮壓暴動車來保護新工出車（開車出廠服務）。”¹⁹

工會和工友便面臨嚴重的考驗，根據他們自己的分析，要贏得最後的勝利，他們必須克服下列的困難：²⁰

（1）工會的領導者應有足夠的決心和毅力；

¹⁶10月26日立法議會演說詞，見新力報編，《新加坡大暴動全貌》，頁41。

¹⁷新加坡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編，《巴聯十四周年紀念刊，1948-1962》（新加坡：新加坡巴士車工友聯合會出版，1962），頁23。

¹⁸所謂“黃色工會”是指那些保護雇主利益，而非工人利益的工會。通常是由雇主暗中扶植的工會。

¹⁹《巴聯十四周年紀念刊，1948-1962》，頁23。

²⁰同上注。

- (2) 必須鼓起工友對戰鬥的信心及堅持性；
- (3) 爭取群眾的同情，支援罷工；
- (4) 阻止資方的繼續營業。

工會和工友剷除阻礙，贏得最後勝利的過程是高潮疊起，甚至是充滿暴力和血腥。在勞工版的歷史中，罷工工友是被動的，被欺壓的。他們獲得其他行業勞工的支援，以及學生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同情，最後導致新加坡多處地區暴動和騷亂。其中關鍵的事件發展包括 4 月 27 日，當罷工工友繼續進行和平糾察，並前去向新工進行勸說時，遭到警方的武力驅散，“拳頭，警棍，藤盾像暴風聚雨般落在工友身上，致發生不幸事件，當場有數名工友被毆昏倒，十餘名受傷。”²¹ 根據工會的記錄，警方的暴行“激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公憤，當天就有數千人到場慰問及援助，大家看到受傷工友的傷況後，均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²² 他們認為，由於警方的暴行，使他們達到贏取群眾的同情心和爭取群眾支援罷工的目的。結果，以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為首的十七工團開會決定聲援罷工工友。要求警方停止暴行，否則威脅發動總罷工。²³ 在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下，緊張的情勢才暫告緩和。

5 月 10 日，警方與罷工工友再次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動用水力等方法驅散罷工工友，一陣猛射之後，多名工友受傷倒地。巴聯和十七工團鑒於事件再度惡化，分別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內容大同小異，都是鄭重向政府抗議以武力鎮壓罷工的行為，同時呼籲其他工會和工友回應和支援罷工抗議行動。²⁴ 警方為了儘快結束歷時超過兩周的工潮，不認真理會工會的警告，反而在 5 月 12 日再次以催淚彈，警棍和水力驅散罷工群眾。以便結束工潮，讓巴士恢復正常行駛。警方首先“在現場佈置了水龍頭。一名警官用擴音器向群眾呼籲讓公共汽車駛出。罷工者自然唱反調，又擡起一名工人，讚揚他是罷工英雄。”²⁵ 這個舉動是將勞工當作英雄的好例子。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罷工人士的情緒激昂到敢以肉身來阻擋巴士。但是奉命行事的鎮暴警察還是採取驅散行動。由於水力猛烈，許多工友不支倒地，造成二十余名工友受傷。根據工會的紀錄，勞工陣線政府“低沽了群眾的力量，僅僅一味採取高壓手段，企圖壓服工友，事實卻相反，工友的鬥志愈堅強情緒愈來愈高漲，而警方殘無人道的暴行，引起了廣大群眾給與罷工工友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全力的支援。”²⁶ 被激怒的群眾，向一股洪流發泄在新加坡的各個角落，造成一次群眾大暴動，即所謂的“福利巴士大暴動”。

²¹ 同上注。

²² 同上注。

²³ 同上注。

²⁴ 同上注，頁 23-24。

²⁵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頁 287。

²⁶ 《巴聯十四周年紀念刊，1948-1962》，頁 24。

暴動發生後幾天，恐怖氣氛仍然籠罩新加坡。這個工潮事件的結果是如何呢？工會宣稱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他們強調“武裝的鎮壓並不能制服工友而使工潮跨下來，相反的，罷工工友始終保持冷靜，工潮是全面的擴大，各行業二萬名工友紛紛回應罷工。”²⁷換言之，工潮並沒有因為暴動而停止，實際上，許多的工潮繼續在和平中進行。使整個社會次序破壞。在野的各政黨也一致評擊政府處理工潮的無能，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政府特召集立法議會特別會議，討論當時的不安局面及採取有效步驟。5月16日，首席部長馬紹爾鑒於局勢的不斷惡化，直接出面幹預工潮。政府要求資方接受勞方的要求，其中包括無條件承認巴聯作為工友的合法工會，以及讓所有參與罷工的工友恢復工作。政府的這個裁決，無疑是罷工工友及其工會的重大勝利。因為資方已經被迫作出讓步。難怪工會的紀錄中寫道，“在工友堅決不渝的團結下及在全星工友兄弟的支援下，這場艱苦，殘酷的鬥爭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²⁸這個結局正如西方浪漫劇的結局，英雄經得起種種考驗，終於將惡魔打敗，並得到最後的勝利。

從本質上來討論，歷史當然不像浪漫劇。因為史事是真實的，不像戲劇是虛擬的。但歷史的解釋方法和戲劇的排演方式卻有相似之處，都是具有彈性和可變動性。對歷史解釋的彈性在於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可能對同一個歷史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就像新加坡福利巴士工潮的這段歷史，執法者的看法和理解就與參與罷工的工人和工會有所不同。另外一方面，戲劇排演的可變動性在於同一部劇本，類似的情節，卻可以由不同的人來演出，而得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在浪漫劇中扮演英雄和惡魔角色的演員是可以互相對調的。下面這部分就以另外一個版本的工潮歷史，討論新加坡福利巴士工潮事件。

三、工潮是顛覆政府的鬥爭：官方版的歷史

在這個版本的工潮歷史中，英雄和惡魔的角色仍然很明顯。代表英雄的是政府當局，包括政府領導人和他們的執法者，如軍警等。而代表惡魔的當然就是製造工潮的工會和工友，以及在幕後煽動和操縱工潮的馬來亞共產黨。英雄的責任就是要斧底抽薪，消滅正在坐大的馬共勢力，才能根除工潮的源頭。

1954年，勞工陣線政府放鬆對工會的限制和控制後，馬共抓緊機會，積極滲透星加坡廠商工人職工會（Singapore Factory and Shop Workers' Union or SFSWU）。思想左傾的工會秘書林清祥（Lim Chin Siong）積極招募會員，在十個月內將會員人數從三百余人增加到約三萬人。²⁹據估計，當時新加坡已有2,500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其中700

²⁷ 同上注。

²⁸ 同上注。

²⁹ 顏財榮，〈新加坡的勞工運動〉，新加坡：南洋大學榮譽學士論文，1970年，頁12。

人已經滲透進總部設在密駝路（Middle Road）的星加坡廠商工人職工會。³⁰此時，密駝路的職工會勢力已經超越所謂“非共”工會於1951年所組成的新加坡職工總會（Trades Union Congress, or TUC）。新加坡職工總會成立時，有28個工會會員和約24,000工人會員。但到了1953年，只剩24個工會會員。而且，工人會員也在繼續減少。其中一個因素是受英語教育的職工總會領導層與受華語教育的工人大眾脫節。³¹也因此，受華文教育和具有群眾魅力的林清祥才更容易吸收工人階級。

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正考慮縮減1948年緊急法令下所賦予警察的極大權力。新加坡總督於1955年4月22日在立法議會新會期的開幕演講中宣佈這個政策，議會也隨後通過減少警察權力的法案。³²在緊急狀態時期暗中招兵買馬，積極擴充勢力的左派工會見機不可失，馬上將階級鬥爭的伎倆搬上臺面，煽動勞資衝突，號召怠工或罷工以向資方施壓。因此，從1955年4月至9月的六個月間，由密駝路職工會策劃和支援的罷工事件就有162件之多。³³而1953年和1954年的罷工事件總數才十餘件。相比之下，有明顯的差別。福利巴士工潮事件就是1955年工潮高峰時期的產物。

福利巴士工潮所引發的衝突，官方版歷史認為是罷工工友和支援罷工的群眾首先攻擊警察，導致警方還擊，才引起暴力衝突。因此，正義是站在執法者這一邊。Clutterbuck主要根據官方資料指出，在5月12日下午4時，福利巴士公司的亞歷山大車廠內外已經聚集約二千名支援罷工的工人和學生等群眾。群眾中有一部分人（約一千人）起哄而導致第一輪衝突的發生。這些所謂的“暴民”（mobs）開始攻擊維持次序的警察。³⁴警方不得已，以催淚彈驅散鬧事的群眾。另外一個報告指出，當天的騷動已經不單純是工人在鬧事，華校生，私會黨徒，以及政客也在煽風點火。³⁵下午的那一場衝突規模較小，但到了夜晚，群眾四處出擊，採取打了就跑的攻擊方式（hit-and-run attacks）突襲警察。新加坡所有的警察都被動員控制局勢，但被訓令盡量避免對群眾開火。³⁶所以導致在暴動中的四名犧牲者之中竟然有兩名是警察。從死者的慘相可

³⁰ Dennis Bloodworth,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6), p.77.

³¹ “Notes on Three Growing Forces among Singapore Chinese: Political Parties,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Arthur Doak Barnett, *Reports on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55), p. 16.

³²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108.

³³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100.

³⁴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 109.

³⁵ “A Chronology of Three Months of Unrest in Singapore,” in Barnett, *Reports on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p. 5；有關私會黨徒參與騷亂及趁機襲擊警察事，見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73.

³⁶ “A Chronology of Three Months of Unrest in Singapore,” in Barnett, *Reports on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p. 5.

以看出暴動的可怕和非理性。其中一名死者是華籍警員（detective corporal），它被暴民淋灑汽油後，被火活活燒死。另一名華籍自願警察（volunteer special constable），則被活活打死。第三名死者是一名美國通訊社(United Press)的記者，他在採訪暴動時不幸慘遭暴民打死。第四名死者是一名16歲的華校生，他是被流彈意外打中胸肺。當時一群暴民正在攻擊一名警車上的英籍警曹，警曹開槍警告和驅散群眾，結果意外射中那名學生。據說，這位受槍擊中的學生本來還有被救治的機會，但暴民卻將學生擡街示衆。試圖煽動旁觀者的情緒。最後導致耽誤受傷學生送醫急救的時間，結果無法起死回生。³⁷

Clutterbuck 還認為福利巴士勞資雙方之所以會有激烈的衝突，其中因素還包括華族社會中政治勢力的對抗。福利巴士工友主要是左派或共產黨的成員和支持者，而福利巴士的老闆則是右派或國民黨的支持者。³⁸ 在中國政治鬥爭中的兩股勢力也蔓延到新加坡華人社會，更加劇當地社會的動蕩不安。

福利巴士罷工事件的結局，表面上是左派工友的勝利。因為政府最後向勞方讓步，裁定資方必須重新雇用被裁退的工友和支援他們的罷工工友，也允許左派工會，即巴聯，繼續作為福利巴士工友的工會。這樣的結局，也是馬紹爾（David Marshall）政府的最佳妥協方案。因為正如同馬紹爾的傳記作者所言：“作為一個民選的新加坡政治領袖，他[作者按：馬紹爾]有責任維護法律和維持社會次序，但作為一個自由民主派領袖，他也不能阻止工人罷工的權力。”³⁹

但就整個事件的影響而言，可以說是對政府和警方有利。因為這個暴力流血事件讓民衆認識到暴力的可怕，也使得不久前在立法議會通過的放鬆緊急法令的一些條文被刪除。例如，警察總長再次賦予可以視需要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佈戒嚴令。⁴⁰ 所以，政府在福利巴士事件中的表面挫折，只是浪漫劇中英雄必經的過程。只要英雄有毅力，能堅持，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政府（英雄）這一邊的。1961 年以後工運的發展，便印證政府的最後勝利。由於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中以李光耀為首的務實派，肅清了以林清祥為首的極左派，使到工運受到重挫。從此罷工活動明顯減少。由 1961 年的 116 次工潮，降到 1963 年的 47 次，再下降到 1965 年的 31 次。⁴¹ 此外，執政黨扶植的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逐漸取代左派工會的影響力，並

³⁷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p. 109-110.

³⁸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 109.

³⁹ Chan Heng Chee,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0.

⁴⁰ Clutterbuck,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p.110.

⁴¹ W.E. Chalmers and Pang Eng Fong,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Ooi Jin-Bee and Chiang Hai Ding, eds.,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9), p.113.

將職工運動導向以協調取代對抗的路線，即以勞資政三方來協調解決問題，以代替過去的勞資兩方的對抗和衝突。

四、福利巴士工潮的意義

福利巴士工潮和暴動，雖然不是新加坡歷史上死傷最嚴重的暴動，⁴² 但其歷史意義卻是重大和多方面的。

第一方面，因為來參加和支援工潮的人群中有許多的華校中學生，見證了勞工和華校生這兩大被殖民地政府長期歧視和忽略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合作。⁴³ 這對往後幾年新加坡群眾運動的發展特點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譬如 1956 年 10 月 25 日的新加坡大暴動，⁴⁴ 即可說是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合流的繼續發展。⁴⁵ 所不同的是福利巴士大暴動是由工潮演變而成，而新加坡大暴動卻是由學潮開始形成。無論是那一次暴力工潮和學潮，勞工和華校生的緊密聯繫已成為公開的事實。他們相互扶持，在工友罷工時華校生就組團慰問；當華校生髮生學潮時，工友亦會前往支援。兩股力量所彙集而成的影響力與破壞力，也徹底的在福利大暴動中展現出來。

第二方面，福利巴士工潮已不只是一件單純的勞資糾紛，而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反殖民鬥爭，甚至是馬共有計劃的顛覆政府行動。從以下三點可以看出端倪。首先，整個事件過程中表現出來高度的組織性。其他工會的工友和華校生組團慰問罷工工友並不稀奇，但是讓人質疑的是於 5 月 12 日暴動當天，竟然有 37 輛載滿大批工人和華校生的卡車和巴士車，絡繹不絕的於同一時間駛抵車廠。這個事實說明事前必定經過極為詳密的策劃與聯絡，讓人不得不懷疑幕後有一政治勢力在操控著一切。因為只有政治集團才有如此財力、物力與號召力。果然，在這批群眾抵達之後，暴動隨之發生，證明暴動的發生是事前策劃的。其次，華校生在罷工潮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成功籌得約六萬元的鉅款，清楚地顯示他們是有組織地被動員起來支援罷工工友對抗政府的行動。⁴⁶ 在暴動中當一名 16 歲華校中學生被警方的流彈擊中後，暴徒竟然無視

⁴² 在 1950 年的瑪麗亞哈篤大暴動(Maria Hertogh Riots) 中有 18 死、173 人傷。死傷情況比福利巴士暴動事件的 4 死 31 傷更嚴重。

⁴³ 華校生的參與是因為他們認為華校生是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歧視政策 (包括對華文教育的歧視和對華校畢業生的雇用歧視) 下的受害者。

⁴⁴ 關於此次新加坡大暴動的始末，可參考新力報編，《新加坡大暴動全貌》(新加坡：新力報出版公司，1956)。

⁴⁵ 10 月學運期間，左派工會在財政物資及道義上支援集中在校園的學生。例如，新加坡巴士車工聯曾安排六百人於 10 月 24 日到華僑中學去慰勞訪問學生，另外三百人到中正中學總校。見首席部長林有福在立法議會致詞，載《新加坡大暴動全貌》，頁 34。

⁴⁶ 《新加坡大暴動全貌》，頁 20。

於他的傷勢，而擡著他到處遊行了兩個半小時，企圖煽動起一般百姓對警察和政府的不滿情緒。這名學生最終因為被拖延了醫治的時間，傷重逝世。言論親政府的《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就曾對這次的暴動作如此的評論：“事實上，巴士工友的罷工已不再是一工業糾紛。整件暴動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對法律、和平和社會秩序的挑戰……是受到一組織的集中指揮，目的則是為了擾亂和破壞。”⁴⁷

第三方面的歷史意義，是可從福利巴士大暴動看出受華文教育人士(包括工人和學生)對英殖民政府實施多年的歧視政策的不滿。戰後以來，他們的反殖民情緒受到英殖民政府的抑制，無處宣洩。隨著本土政治黨團—勞工陣線—的上臺，壓抑多年的不滿情緒終於有機會爆發。在馬共組織的蓄意挑釁和從旁推波助瀾下，至 1955 年中期，受華文教育群眾的反殖民情緒已形同萬丈烈焰。馬共的煽動和華文教育者的不滿情緒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即是將原本為一簡單的勞資糾紛，轉換為反殖民統治的鬥爭。正如李炯才的回憶錄所言，新加坡公共汽車工人工會雖然是共產黨領導，但此次的罷工政治因素大於一切，而且一般民衆也認為工人有理，尤其是接受華文教育的人士普遍持有這個觀點。⁴⁸

由此可知，福利巴士罷工和暴動事件並不是偶發，而是戰後反殖民政策，反現有社會次序和反經濟壓迫等因素彙集而成的集體反應。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其不同的動機，幕後的煽動者也有其不同的目的，例如馬共就試圖利用工潮製造社會脫序，達到顛覆政府的目的。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找到機會來公開表達他們的不滿，也找到機會來實現他們的鬥爭。福利巴士罷工事件正是那個很好的機會。所以當各方都找到一個交集點的時候，這個本來是單純的工業糾紛，就變成激烈的群眾運動。

五、結語

回顧新加坡福利巴士工潮事件的歷史，可以發現至少有三種版本和解釋。第一種版本是史事版，它將工潮當作一件歷史事件，平實的記載一些沒有爭議的事實，包括：工潮的確發生在 1955 年 6 月、工潮是由勞資雙方的爭執所引發的、工潮後來演變成流血衝突、工潮最後在政府和資方的讓步下結束。但第一種版本的歷史沒有辦法解決一些耐人尋味的問題，例如：到底是政治因素或是經濟因素造成工潮的發生？誰是工潮的真正禍首？為何其他的工潮可以避免演變成流血暴動，而福利巴士工潮卻無法避免？到底誰是真正的勝利者和獲益者？

勞工版和官方版的歷史都對史事版歷史沒有回答的問題作出解釋，但答案卻完全相反。勞工版的歷史認為工潮的起因是由於勞工受到經濟的剝削，殖民地政府和資產

⁴⁷ *Straits Times*, 12 May 1955; Cited in Goh, "The Hock Lee Bus Riots 1955," p. 22.

⁴⁸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頁 288。

階級要負起禍首的責任，流血衝突是因為警方蠻橫的驅散行動造成的，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反殖民和反階級鬥爭的勞動階級。

官方版的歷史則認為工潮的發生是有其政治陰謀的，是馬共支持者企圖破壞社會次序，進而推翻政府的手段。因此，禍首是幕後的馬共份子和領導罷工的左派工會領導人。流血和傷亡事件也是工潮製造者故意促成的，以便激起群眾的情緒和博取大眾的同情。資方最後的讓步和妥協，是因為政府要緩和局勢，結束工潮，以爭取時間從長計議，徹底解結工潮的根源。所以，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政府的。

由於上述三種版本的不同，尤其是後兩者對歷史的解釋互異，主要是歷史敘述者的出發點不同，對問題的考慮方向和關心重點也不同。勞工版歷史論述者是站在勞動工友的角度出發，看到的是表面的現象，如勞工待遇差，生活貧困可憐，雇主不合理的剝削。他們比較不關心幕後是否有馬共的勢力在煽風點火。而官方版歷史論述者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觀察，看出幕後的黑手是馬共份子，並洞悉他們企圖推翻政府的陰謀。

如果能認識到不同版本的歷史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局限，並把它放置在錯綜複雜的歷史大環境中來討論，可能更容易接近歷史的真相。因為 1950 年代中期的新加坡經濟環境仍然是延續戰後初期的蕭條景象，大部分工人的經濟條件，工作環境和待遇都差，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戰後共產主義的擴展，企圖顛覆各國政府的事實，也在世界各地上演。因此，當大部分掙紮在生存線上的工友，急需依賴工會的力量爭取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這正好可供馬共成員利用，發揮他們的組織專長和煽動能力，因此新加坡的工潮便相繼發生。

福利巴士工潮的結局是左派工會的勝利，這是事實。但是，左派工會的勝利是短暫的。接替馬紹爾政府的林有福政府，以及 1959 年後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都認清工運的複雜性和可怕力量。因此，分別採用不同的方法應付。林有福選擇高壓政策，而人民行動黨政府則在上臺執政後，修定相關的勞工法律，將勞資關係導入正軌。同時整頓工會組織，使工會成為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合作夥伴，而不是社會穩定的絆腳石。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mpact on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Kam-Hing Lee

Star Publications (Malaysia) Bhd, Malaysia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and the subsequent efforts by the affected countries at economic recovery serve as a convenient context to look once again at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region. Not so long ago, as economic growth was gathering pace in what had been described as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the role of Chinese business was widely considered a significant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this impressive progress.¹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estimated to be about 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ere said to own some 70 % of firms listed in the stock exchange there. In the Philippines, some 50 to 60 percent of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the stock exchange were reportedly held by the Chinese who form only 1.5%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In Malaysia, the Chinese who comprised less than 30% of the populations were estimated to own more than 40% of the corporate equity while in Thailand it is said that 50 ethnic Chinese families control most of the country's business sectors. These highly publicised profile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business attracted great interest especially in academic studies and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ir strong presence in the differ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Yet even prior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ile accepting the dynamic contribu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to the local economy there were cautioning notes about the extent of that dominance as well as the enduring strength of that position. The figures showing business control by the Chinese were questioned and it was argued that it should be revised downwards. It was also maintained that Chinese business, given the general political weakness of the community, were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to policies that limited the capacity for growth or of the ability to move into new sectors. In most cases they were forced to rely on connections to power groups. Consequently, Chinese business in certain countries remained uncertain even where they appear to be dominant.

And so when there was a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scale such as that of 1997, it was to be expected that Chinese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would be most affected. Indeed, this generally did happen. Significantly, however, Malaysian Chinese business seemed to have suffered less than their Indonesian and Thai counterparts. The total number that might be

hit does not come anywhere near Thailand where it is said that of the 50 over Sino-Thai families that controlled most of the Thai economy, only 4 survived. Nor were the big ones as affected as thos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and intensity. In Indonesia, several prominent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Indonesia, including the huge conglomerate of Lim Swie Liong, have almost collapsed as a result of the crisis. The impression also is that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did not suffer to the same extent as that experienced by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Ye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is no easy task. There is first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isis. It was at once a currency and a debt crisis, and a crisis of economic growth. Added to this is the governmental response, which had subsequent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Second, Chinese business is not homogeneous. There are big and small businesses. As Jamie Mackie pointed out, in response to the common practice among many in primarily identifying Chinese business with the big corporate players, there are really few studies that examine in detail Chinese business at lower levels. Until such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it is hazardous to draw general conclusions about Chinese business in any particular country. This paper makes no pretence to being exhaustive. Rather it attempts to show the complexity of dealing with such a subject: where data can be found, the impact would be analyzed and the findings discusse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risis are a matter of some debate. One position attributes it to economic mismanagement,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to corruption and cronyism that are found in the affected countries. The other blames the massive and unregulated outflow of capital that has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the countries involved. A middle ground includes the major arguments from both sides.ⁱⁱ The purpose here is not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three but to consider its impact on three areas: the currency, stock market and loans (the direct impact); the general economy (the indirect impact); and the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it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The first affects mainly businesses that are highly geared. The second concerns the slowdown brought about by the liquidity crunch and the general loss of confidence that followed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affected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s significant in two respects. By stemming the outflow of capital through capital controls, it saved the economy, and hence some Chinese business, from devastation. The point here is not whether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measures or IMF intervention was the most suitable but rather the economic stability that ensued from it. The second is the pegging of the Malaysian ringgit at 3.8 to the US dollar where, under the free exchange rate, it was 2.5. This made Malaysian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and benefited the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SMI)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exported.